

· 笔谈: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

本土化: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创新的必然路径

张文宏

(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毋庸置疑,学科意义上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从严复介绍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算起,中国社会学历史超过了百年。但是,1953年至1978年,中国社会学被迫取消和中断。从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至今,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目前,中国在300余所大学开设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等本科专业,授予社会学硕士学位的机构达100余所,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机构达23所,独立的专职社会学科研机构约50余所,全国社会学教学科研人员达6000余人^①。特别是近40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出版了大量的论文、专著、教材、译著,为社会学学科的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一门引进学科,无论是在初创时期,还是在恢复重建时期,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必需回答、也必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回归或本土化转型,是实现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的不二选择。本文重点讨论如何实现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

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学派走出去,在国际社会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发挥重大影响力。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曾经连续10余年GDP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更于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我国有经济发展的“深圳模式”、“浦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有社会治理的“沈阳模式”、“江汉模式”、“上海模式”,有社会资源动员的“北京奥运模式”、“上海世博模式”和“杭州G20模式”,但是除了工作经验总结式的研究报告以外,社会学者并没有从理论上和学术上系统地提炼和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制度社会学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及社会资源理论,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也多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没有形成对世界社会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成果。

只有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通过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的实证资料,才能总结出创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奇迹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中国学派,与西方的主流理论平等对话。郑杭生先生认为,所谓社会学的本土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社会学的发展,其标志是由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②。用独创的中

[作者简介]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根据教育部社会学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社会学学会的相关统计数字估算。

②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国理论和中国学派讲述中国故事,而不是用中国的资料印证西方学者的理论和研究发现。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对世界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发展做出真正的贡献,才能在世界社会学学术舞台上掌握话语权。

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视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第一,应该重视对优秀的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挖掘、传承和再建构,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汲取灵感、养分和精髓。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中,存在着“西风尽吹”而“中学边缘化”的现象。即在中国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现象的经验研究中,不是从真实具体的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出发,而是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社会的经验,盲目崇洋,对本土思想文化缺少深刻的省察。在研究之先,即将西方理论看做一种公理,从而使其研究失去了自主性,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变成了一种简单的验证式研究。另外,虽然国内多数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体系设有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的课程,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本土课程并没有被设为专业必修课和主干课,处于边缘化的地位^①。因此,注重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鲁迅^②等一大批中国传统思想大家的论著中挖掘关于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社会治理的经典论述,是社会学学科本土化的重要基础。

第二,加强对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学家的本土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建国前潘光旦的社会生物学理论,孙本文、吴泽霖、胡鉴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孙本文、黄凌霜、陈序经、吴文藻等人的文化理论,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梁漱溟、晏阳初、李景汉的乡村建设学派,孙本文、朱亦松、龙冠海的综合学派,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的社区学派,李大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区进行的农村调查、杨翰笙在国统区进行的农村调查等,在早期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③。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出现了许多大师和杰作,比如潘光旦的《优生与文化》和《优生原理》、吴泽霖的《社会约制》、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林耀华的《金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④,当时的中国被誉为生机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被认为在思想质量上除北美和西欧之外的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

第三,必需在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主流的思潮、概念、理论、模型、研究方法、学术传统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对其精华予以借鉴和吸收,对其糟粕进行扬弃与批判。社会学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社会学学科初创时期和恢复重建过程中,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无疑对中国社会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在1990年代以前,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绍和评价,曾经作为主流社会学期刊乃至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的固定栏目,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创立、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学科引进和恢复重建的阶段,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概念、模型、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盲目地不加批判、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则永远不能摆脱中国在国际社会学的边缘地位。以至于多数国内社会学专业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理论框架多数以西方的某种宏观理论或中层理论为参照,写作格式也完全以西方社会科学的洋八股为蓝本。

①田毅鹏《社会学学科话语体系构建中“中西贯通”问题》,《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2期。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③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74页。

④李培林、渠敬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学术史》,载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阅读》(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中国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对上个世纪台湾学术界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大陆的境况。杨国枢认为,二战以后,台湾长期处于国际政治与经济网络的边缘地位,时常受到来自欧美国家的一面倒的影响。在这种世界秩序的局限下,台湾的学术一致陷于无可抗拒的入超的困境,学术界沦为西方学术的“消费者”,甚至成为后者的附庸。这种情形,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界特别明显。在过去三、四十年(1947-1987),在台湾成长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者,大都是以学习与吸收欧美核心国家的学术为能事。经过长期的“学术洗脑”,社会及行为科学逐渐失去了思辨的能力与信心,对欧美的学者萌生了不移的权威崇拜,使此间的学者长期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上难有重大的突破与贡献^①。

因此,只有通过西方社会学的概念、范式、理论和方法的批判、质疑及反思,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才能创造出与西方理论和方法对话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才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新的综合,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连接起来。

创建与西方并驾齐驱的社会学学科评价和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与学科评价体系对国内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方面,其影响尤为显著而突出。国内也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指标和评价标准作为学科评价和学术评价的关键指标。获得学界和学者认同的学科评价和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风向标。对于国内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学术和学科发展水平的评价,必需在借鉴西方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社会学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学术和学科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逐渐形成与西方评价指标并驾齐驱的“中国标准”,特别是在主要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领域,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和学术评价体系应该也必需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引领作用。社会学学科和学术评价的“中国标准”不仅应用于对中国社会学学术机构和社会学学者的评价,也应该用于对国际上中国问题、中国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评判。

抓住大数据时代的契机,在世界范围内提出独创性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引领国际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方向。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海量信息数据呈现出爆炸式增长。许多顶尖的国内外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预言,大数据将颠覆传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带来社会科学的革命。大数据时代有几个特征:(1)数据量大。大数据的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1000个T)、E(100万个T)或Z(10亿个T)。2016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3亿。由互联网应用所产生的大数据规模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2)类型繁多。包括网络日志、音频、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等,多类型的数据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价值密度低。如随着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感知无处不在,信息海量,但价值密度较低,如何通过强大的机器算法更迅速地完成数据的价值“提纯”,是大数据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4)速度快、时效高。处理速度快,时效性要求高。这是大数据区别于传统数据挖掘最显著的特征。

但是,国内外关于大数据科学领域的应用目前主要集中于资料的收集和储存方面,对于用什么方法分析这些海量数据,用什么理论解释互联网世界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社会角色、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这些社会学的经典问题,国内外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通过我国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有可能提出独创性和原创性的分析方法、研究范式、理论体系和国际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领跑。

[责任编辑:翁惠明 wenghm@vip.163.com]

^①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5页。